

# 《广校雠略》在张舜徽学术著述中的地位

李华斌 鲁毅

**摘要：**《广校雠略》为张舜徽文献学的发凡起例之作，体现其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和风格，规定他后来的学术历程，“乃至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面貌”。张舜徽治学归宗于清学，《广校雠略》是其清理清学的起点，对他后来全盘整理和研究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**关键词：**《广校雠略》；学术；地位

**中图分类号：**G256.3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10)02-0104-07

《广校雠略》为张舜徽文献学的发凡起例之作，体现其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和风格，规定他后来的学术历程，<sup>①</sup>“乃至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面貌”。<sup>②</sup>因此《广校雠略》为研究张氏文献学的一部入门书，或理解张氏文献学乃至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把钥匙。其次，张氏文献学包括《广校雠略》有很大部分涉及清代学术的整理和研究。张舜徽治学归宗于清学，《广校雠略》对清代学术的初步耙梳清点，是其清理清学的起点，对他后来全盘整理和研究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张舜徽《八十自叙》说：“……至于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平生致力于斯，所造亦广。若《广校雠略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、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、《汉书艺文志释例》、《四库提要叙讲疏》诸种。固已拥彗前驱，导夫先路。”张舜徽学术著述旨在“津逮”初学，“俾学者由此入门，以得文献整理之术”；他自喻前驱，为后来者清扫治学之路上的障碍。然如把《广校雠略》放于张舜徽学术著述中考察，它也为前驱，是后来继续从事文献学、清学研究的先路之导。

## 一、导文献学研究之先路

张舜徽文献学研究四部著述《广校雠略》、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、《中国校雠学概论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为文献学建构较为完整的知识、思想体系。而《广校雠略》与后三部著述关系密切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为指导后辈校读古籍，张氏选择《广校雠略》中“一些更为切实的材料，经过进一步地补充和分析，写入了《校读法》。”<sup>③</sup>由于“在历史系四年级开过《中国校雠学》的新课，认为早年写的《广校雠略》是用文言文撰述，由一百篇短文组成，不宜课堂教学，于是别定体例，厘析篇章，配合科研，加深加广，重新编写《中国校雠学概论》。……通过教学实践，和业务上的进一步钻研，所编讲稿，较之《广校雠略》详赡多了”<sup>④</sup>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为给历史文献学构建学科理论体系，张氏把《广校雠略》、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、《中国校雠学概论》的材料与观点归纳和深化，“于是《中国文献学》哀然成帙，将近三十万字”<sup>⑤</sup>。从张氏自述来看，《广校雠略》是后三部著述形成的基础。

鉴于《中国校雠学概论》（1979）稍微早于《中国文献学》（1982），为过渡之作，影响不大，且没列入“张舜徽先生著述目录”<sup>⑥</sup>，姑且不论。下面把《广校雠略》与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、《中国

①李晓明《〈广校雠略〉条辨》，《张舜徽学术研究》第1辑第155页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。

②周国林《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，2003年1月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03-18

作者简介：李华斌（1971-），湖北汉川人，武汉大学古籍所博士生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古典文献学。

鲁毅（1949-），湖北武汉人，湖北大学古籍所教授。研究方向：训诂学。

③张舜徽《切庵学术讲论集》中的《三十五年来我是怎样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的》第698页，岳麓书社1992年。

④同上，第692—693页。

⑤同上，第692—693页。

⑥《张舜徽先生著述目录》以《张舜徽学术论著选》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，12）第647—649页为准。

文献学》的基本内容作比较厘析,看看《广校雠略》关于文献学的基本理论、观点如何被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承袭?

### (一) 关于著述体例<sup>①</sup>

《广校雠略》“著述体例论 10 篇”和《中国文献学》第 2 编“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”都先述著作、编述、钞纂三者之别,再具体介绍每一种著述体例。由于内容相同,《中国文献学》绝大部分书证材料多来源于《广校雠略》,主要观点承袭《广校雠略》。但《广校雠略》意在考辨学术源流;《中国文献学》把“著述体例”归入“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”,用 5 章的篇幅介绍文献学的“共性”特征,旨在构建理论体系。由于立意不同,两者形式不同。

### (二) 关于古书体例

《广校雠略》详论“古书体例”,有著述标题论 8 篇、作者姓字标题论 5 篇、补题作者姓字论 4 篇、援引古书标题论 8 篇、序书体例论 5 篇,总共 30 篇,占全书篇幅约 1/3。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第 1 编第 1 章第 3 节“分析篇章”和第 3 编第 1 章“了解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”、第 2 章“认识古人著述体要”与之相应。与《广校雠略》相比,选择的材料更适用,另补充“古代历史书籍中有并存异说变易旧文之例、有自加注语之例”两种体式。

一般认为,古书体例属文献学最基础知识,读者翻开古书,就有感性认识,因此除洪湛侯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“叙议文献的体例”作专章论述,其他以“文献学”署名的专著几不涉及。其实,文献体例具有“共性”,带有通论性质的文献学著作应涉及文献的形体知识。邓声国《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容设置问题之我见》认为,一本内容设置完整的通论性古典文献学著作,其所需论述的内容,至少应包括七个方面的知识,其中“历代文献涉及到的各种形体知识的介绍”:

它主要涉及文献的载体、文献内容的体裁、文献编撰形式的体裁、文献的体例、文献的体式等相关知识。就这一部分学科内容而言,洪湛侯先生的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一书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蓝本。<sup>②</sup>

《广校雠略》应为带通论性质的校雠学著作,<sup>③</sup>

以文献体例为“校雠学”的基本内容,独具慧眼,超越了时代;且它论文献体例,考证精审,发现或发明甚多,学术贡献大,仍值得今天通论性质的文献学著作借鉴。

张舜徽擅长籀绎古书体例,包括序书体例、著述体例、目录体例、注释体例等,有关体例的著作有《〈汉书艺文志〉释例》、《毛诗故训传释例》、《世说新语注释例》、《切韵增加字略例》、《郑氏训诂学发例》、《郑氏经注释例》等。他说:“古人著述,不言例而例散见于全书之中,后人籀绎遗编,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,信能执简驭繁,持类统杂。举凡学术之升降,著述之纯疵,悉可见于此。施之初学,尤足以开悟涂辙,益人意智也。”<sup>④</sup>由于体例能“执简驭繁,持类统杂”、“既以考明昔贤著述之体,亦可启示后学治学之方”,所以“释例之作,为不可缓。”<sup>⑤</sup>

解读张舜徽“体例学”思想,主要有两个方面:  
①从学术的高度(学术之升降、著述之纯疵)考察其功能(“执简御繁,持类统杂”)和用途(“开悟涂辙,益人意智”及“启示后学治学之方”);  
②从学术实践考察,籀绎出著述体例、(他人)注释体例、序书体例、编述体例(“存异说变易旧文之例”)、自注体例(“自加注语之例”)等,扩大体例学研究的范围。

《广校雠略》用大量的篇幅考证古书体例,恐怕另有隐情: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为“古籍体例学之作”,可惜没有全部写完<sup>⑥</sup>,卷 4《辨附益》仅有“古书不皆手著”1 节,按原书体例,至少有 2 节空缺。《广校雠略》约 1/3 篇幅(如算著述体例 10 篇,就达 40%)诠释文献的体例,显然有续补《古书通例》的意图,某种程度可当作《古书通例》的姊妹篇。学人一般只注意余嘉锡、张舜徽立说之异,<sup>⑦</sup>而忽视张师承于余,此为明证。《古书通例》隐

性的文献学专著。因而,从大处着眼,可当作通论性的文献学著作。

- ④张舜徽《〈积石丛稿〉自序》,《切庵学术讲论集》第 717 页,岳麓书社 1992 年。  
⑤张舜徽《〈郑氏经注释例〉自序》,《郑学丛著》第 78 页,齐鲁书社 1984 年。  
⑥余嘉锡《古书通例·前言》,上海古籍 1985 年。《前言》为周祖谟所写。  
⑦余嘉锡是张舜徽的四姑父,张氏 17 岁失怙后,曾被其招往北京,张氏住在余氏家中,其间每日赴北海图书馆读书,并且得到不少通人硕学(包括余嘉锡、杨树达)指教。然而其学术观并不相同:余氏学问专精,《目录学发微》视校雠为校勘,认为目录包括校雠、版本;张氏学问淹博,认为校雠包括目录、版本,不承认目录学。

①洪湛侯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也涉及此项内容,把它纳入文献的“形”中,称为“文献内容的体裁”。

②台湾《书目季刊》,2004 年第 4 期。

③把《广校雠略》当通论性的文献学专著是值得商榷。因它承袭传统学术札记体的写法,过分注重学术细节的考辨,通论的特点不突出;然而从书名和内容分析,它应为通论

含对当时如日中天的疑古学派批判,一直“未被世人所重”;后由于帛书、竹简大量发现,学术价值逐渐被学界所认识。客观来讲,古史辨派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上得多于失,在古籍真伪和年代方面的见解上失多于得;<sup>①</sup>而《古书通例》关于古书真伪、年代的立论击中疑古辨伪学风的要害,学术观点至今确凿不移,且被70年代以后的出土简帛文献所证实。《广校雠略》承袭《古书通例》,而并不雷同,考证精核,发现或发明甚多,应为“双璧”,深藏闺中,有待学者发现。

《中国文献学》不谈“古书体例”,可能张舜徽有意保存《广校雠略》谈“古书体例”的特色。张氏认为要从“学术源流和著述体例”理解“目录”的问题,<sup>②</sup>《广校雠略》以体例来诠释解读文献学,可谓张氏文献学的显著特色。

### (三) 关于古书的注疏、辨伪、辑佚

《广校雠略》有注疏流别论2篇、审订伪书论3篇、搜辑佚书论5篇,《中国文献学》第6编归纳为“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”,其中“注解”增加宋儒“六经注我”的义理注经方法,“辨伪”增加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辨伪8法、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辨伪12法,“辑佚”去掉“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”1论。(张舜徽引用梁启超的辨伪12法,被人所讥。<sup>③</sup>其实,通论性质的文献学著作不是考证,引用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,是历史编纂学的需要。)在此基础上,《中国文献学》增加抄写、翻译、考证。学界高度评价《中国文献学》的首创之功,认为它第一次有意识地将辨伪、辑佚、注疏、考证、抄写等文献整理具体工作纳入传统文献学的学科理论体系<sup>④</sup>。平心而议,首次应为《广校雠略》,只是不如《中国文献学》全面、丰赡及影响大;就算归功《中国文献学》,它也源自《广校雠略》。

### (四) 关于古书的传布与散亡

《广校雠略》有“书籍传布论2篇”、“书籍散亡论2篇”。其中关于“印刷术盛行后之利弊”,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有“古书的传播”1节与之对应,却另辟蹊径,重点谈丛书在古籍传播中的

重要作用,而《中国文献学》略去不谈,把“书籍的散亡”分成2章,增加书籍散亡的6大原因。总之,三书各有侧重,各具特色:《广校雠略》中关于印刷术盛行后的四利四弊,特别四弊的论述,<sup>⑤</sup>很有见地,发现甚多;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意在揭示丛书的史料价值;《中国文献学》只谈文献散亡,重在阐明文献的典藏意义。

### (五) 关于目录

《广校雠略》有“簿录体例论4篇”、“部类分合论7篇”。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有“古书的部类”1节,把它细分,列成图表,非常直观。《中国文献学》除把“部类分合”改编成“书目的部类”外,还分“簿录体例”为官簿、史志、私录3节,专题论述。另外,《广校雠略》论“簿录”仅2论11篇,相较校勘的4论15篇,略显单薄;且《广校雠略》以簿录代目录,有意回避“目录”的概念,有轻视“目录”的嫌疑,这与早期拘泥于“目录不能成为学”的思想有关。而《中国文献学》第5编以“目录”标题,有6章论目录,和校勘、版本一样多,论述非常全面,弥补《广校雠略》的缺憾。

### (六) 关于校勘

论校勘,《广校雠略》有15篇,占全书篇幅1/7多;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比重最大,有2编,占全书篇幅2/3左右;《中国文献学》最凝练,有1编,约占全书篇幅1/9。《广校雠略》有“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”,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有“书籍为什么必须校勘”一章对应,且“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之关系”、“字体误增一笔误省一笔之关系”2篇与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第2编第1章第2、3节标题完全一样;而《中国文献学》以此为蓝本,加以剪裁、熔铸,撰为“书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”一章。《广校雠略》中“校书非易事论4篇”就是《中国文献学》中的第3章“校书的条件”;而《中国文献学》调整原来行文的思路,先讲校书者应具备的个人素质,再讲官府组织校书应任专才、资众手,行文顺序正相反。《广校雠略》“校书方法论6篇”,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选用较为“适用的材料,进一步补充分析”<sup>⑥</sup>,撰成第2编第4章“怎样进行校书”,且第2节“不可妄逞臆见,轻于改字”,直接采用《广校雠略》的篇名。

① 裘锡圭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第38页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。

② 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《中国文献学》第103页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。

③ 廖名春《中国古代学术史新证·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评议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。

④ 邓声国《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容设置问题之我见》,台湾《书目季刊》,2004年第4期。

⑤ 这四弊是:1印刷愈便,而记诵日衰;2印刷愈便,而讹误益多;3印刷愈便,而著述日卑;4印刷愈便,而文辞益冗。

⑥ 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《中国史籍校读法·序言》第210页。

《广校雠略》有“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”，《中国文献学》第6章“清人的校书工作”与之相应，但后者内容更丰赡，总结得更全面。

### （七）关于古文献学史

把学术史纳入文献学为张舜徽首创<sup>①</sup>。《广校雠略》最末1卷“汉唐宋清学术论”，实为一部古文献学简史；而《中国文献学》与之对应的是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”、“清代考据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”、“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”三编。两书都从“史”的角度评述一代学术，“有重点地加以介绍，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要胪列无遗”<sup>②</sup>，提纲挈领，持简驭繁，避免卷帙浩繁、博而寡要的赘述。从史的角度来简述文献学的起源和发展，这使初学者对文献学的认识有全面整体的认识，这对通论性的文献学著作尤为必要。

### （八）关于文献学前瞻性的展望

在《广校雠略》的基础上，《中国文献学》增加“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”、“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”两编，对今后具体文献整理的工作方向作前瞻性的展望。目前的文献学著作中，仅张舜徽的著作涉及到了<sup>③</sup>。其中，整理文献的重大任务是修一部《中华人民通史》，张氏把文献学研究的范围扩得很大，体现“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”（梁启超语）的思想。

通过比较分析，可看出张舜徽学术演变的濡渐之迹：在文献学系列著作中，《广校雠略》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，开其文献学研究的先路；书中形成的若干见解，为其一生学术研究所恪守，例如其后来著述，包括清学、史学著作，大量存有“余早岁著《广校雠略》……”。《广校雠略》为张氏文献学研究的先导，是继续从事文献整理实践、文献学理论研究的阶梯。

## 二、导清学研究之先路

清学研究是张舜徽学术研究的重心，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、《清儒学记》构成清学研究系列著述。《广校雠略》未被研究者归入清学研究著作，然《广校雠略》与清学关系十分密切：第一，其每一论、每一篇几乎征引清人的考据

成果；第二，对清代学术的评判是其“辨章学术”的重点，例如直接评判清代学术有11篇，间接涉及更多；“指正清代学术疏漏之处”随处可见；第三，关于校雠学的一些观点源于对清人文集、笔记的耙梳整理。因而可以说，《广校雠略》初步对清学作耙梳整理、对清儒作学术细节批评，实为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对清学的全面整理、《清儒学记》对清学概括性总结的先导。

### （一）导通人学者研究之先路

张舜徽主张通人之学，赞赏通人学者。例如，他心仪“二郑”，以“仪二郑斋”<sup>④</sup>名其室；他把郑玄的经述、郑樵的史裁，比作“灵海乔岳”。<sup>⑤</sup>然对“二郑”一样的通人学者，并非盲目崇拜，而是不苟同，不附和，“大胆提出己见”，讥其考证粗疏，例如《广校雠略》于多处戏称“通人之弊”。

顾炎武为清初大儒，开有清一代学风；然《广校雠略》在“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”说：“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考证《淮南》，亦兼训字标目，皆所谓通人之弊也，更无论世俗昏昏矣。”除《日知录》外，《广校雠略》没提及顾氏其他著作；后张舜徽于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为《亭林文集》提要钩玄；《清人笔记条辨》“条辨”《菰中随笔》；《清儒学记》专立《顾亭林学记》，褒扬顾炎武治学的精神、方法。

“嘉定之学，允推钱大昕为斯文领袖，博大精深，并时无两。”<sup>⑥</sup>钱大昕治学范围广博，造诣精湛；然《广校雠略》“著录之例一书不嫌重见”一篇，于《十驾斋养新录》谓“《隋志》一书互见为史臣粗疏之失、讥《文献通考》一书重出之非”的讹误，提出批评：

然此论不自钱氏发之，郑樵《校雠略》即以《隋志》两类重出，由于分类不明，是非差互，一类两见，为不校勘之过，斯皆通人之弊。

“一书互见”就是章学诚所倡导的“互著说”。钱大昕“挟胸臆之私见，妄訾之”，当然为“通人之弊”。43年后（《广校雠略》（1943），《清人笔记条辨》（1986），张舜徽“条辨”文廷式《纯常子枝语》时，仍恪守《广校雠略》的观点，对钱大昕委婉批评：“皆由不达斯旨，妄议古人，抑亦

①在大陆正式出版的文献学专著中，以吴枫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（1981，2）、张舜徽《中国文献学》（1982，12）为最早，而吴著没涉及文献学史。因而可说张氏最早把学术史纳入文献学。

②张舜徽《清儒学记·自序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。

③邓声国《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容设置问题之我见》，台湾《书目季刊》2004年第4期。

④张舜徽《广校雠略·自序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。

⑤同上。

⑥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中《六九斋撰述稿》第400页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。

通人之弊矣。”<sup>①</sup>然小疵终不能掩大醇，《清人文集别录》总体评价他的学术：“考史之功，为有清第一”；“研精经史，视炎武尤加邃密耳”<sup>②</sup>；《清儒学记》专立“钱大昕”学记，一洗梁启超、钱穆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对钱氏的轻视<sup>③</sup>。

戴震为乾嘉考据学集大成者，治学范围宽广，涉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测算、典制等，考证精核几乎无人能及。然《广校雠略》中“后世著述自题某学之谬”，对戴震昧于著书体例把所著之书自署戴氏的讹误，引章学诚的话严厉批评：“戴君自命太过，而未悉古人体要，不知古书无是例也”。次，别录《戴东原集》时，又对其“好名之念太盛”提出批评<sup>④</sup>；最后，《清儒学记》说：“过去有人认为乾嘉朴学的兴起，以顾炎武为开山祖师。其实顾氏不过在反对空谈、提倡实事求是之学方面，（顾炎武）做了一些工作。具体研究的专门之学，以《音学五书》贡献为大，其他多未涉及。至于博学多通，实际开展对各种学术的研究，则以戴震为先路之导，替乾嘉学者们树立了榜样……戴氏弟子甚多，仅各得其一体……这些人，都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，也都是戴氏门下的得意学生。于是戴氏之学，在乾嘉初期堪称一时的‘显学’。”<sup>⑤</sup>最终张舜徽得出“乾嘉朴学兴起的开创者是戴震而不是顾炎武”的结论，与多数学人看法不同，成为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。

由《广校雠略》（1943年）细微、零散的学术批评始，到别录文集、条辨笔记，末由《清儒学记》（1991年）作总结。张舜徽跨越半个世纪（以书籍出版年月为准），穷毕生精力，才完成对通人硕儒学术的总结和归纳。对通人硕儒，他无意识构建欲扬先抑的研究模式，含有独特的审美意蕴，暗合其治学理路：从微观到宏观，从专精到博通。

## （二）导有“独断之学”的学者研究之先路

《广校雠略》意在指正学术讹误，褒扬学者学术的地方不多。然张舜徽不止一次褒扬的有章学诚、段玉裁等。章、段等不入窠臼，敢于立论，有“独断之学”。《广校雠略》盛赞章学诚识见之高，欣赏段玉裁勇于改字，从中可看出《广校雠略》的学术取向：不能把抄纂、编述当学问，学贵有识，学

者应有自己独立见解，不能人云亦云。

《广校雠略》大凡涉及章学诚，几乎都肯定，这在清代学者中属例外。例如：

1. “论目录学名义之非”中说：“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，但以校雠标目，而不取目录立名，最为能见其大。”

2. “著录之例一书不嫌重见”中说：“近代言校雠者，自会稽章氏，罕能窥见及此。”

3. “论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”中说：“元脱脱等修《宋史》，别道学于儒林，最为后世所讥。若钱谦益、黄宗羲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钱大昕诸家及《四库提要》，诋斥不遗余力，独章学诚称其合于史法，据事直书，未可轻议……章氏知征实矣，故立论独得其平。”

4. “论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”中说：“当乾嘉朴学极盛时，举世以征实博考相高，鄙蔑宋儒空疏为不足道，诋讥朱子尤厉。章学诚独昌言矫之曰……论者叹为知言。”

章学诚学博识高，不苟同乾嘉考据学派而卓然独立，不屑于考证之学。《广校雠略》肯定他学术上的贡献，且褒扬他远远超出同代人的真知灼见；但对他考证疏舛之处，也不回避，例如“论纪事本末”说：

章学诚尝谓纪事本末之体，原本《尚书》……若纪事本末之书，则实古无是体，而宋人创之，礼以义起，为用尤弘，何必远攀三古，谓为《尚书》之遗教乎！

“论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”说：

后人徒鉴于唐世官修诸史行而私门著述废，章学诚《方志略例》遂谓史学亡于唐，斯固未暇核情实，而漫为抑扬之辞，非定论也。<sup>⑥</sup>

章学诚为张舜徽所推扬，《广校雠略》肯定多，批评少；然在《〈文史通义〉平议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中，沿着早年治学足迹，张氏对章学诚的认识更深入，因而批评得更多，更严厉，“恨之深，爱之切”。

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，穷32年之苦心钻研，“其发凡起例之处，尤多孤诣”，故《广校雠略》推崇其精博。例如《广校雠略》中“论校书必深于小学”说：

以此益叹段氏识解之卓，非后人所易学步也。与段氏同时精校勘者，犹有黄丕烈、顾广圻二家。丕烈校勘之学固出于段氏，广圻则与段氏往复论难

①张舜徽《清人笔记条辨》第396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。

②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第185页。

③梁、钱同名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皆不为钱大昕立传，钱氏认为他“识力不高”，梁氏把他列在赵翼、王鸣盛之下。

④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第177页。

⑤张舜徽《清儒学记》第139—140页。

⑥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《广校雠略》第93页。

者也。而极其所诣，俱不逮段氏远甚。此无他，学之浅深不同耳。

段玉裁勇于改字，学者大多讥其逞臆武断、擅改原书，但《广校讎略》“论金坛段氏之勇于改字”说：

舜徽则弥服其博征精订，多得作者用心，有以复古本之真，为功固不细。尝以唐写本《说文》木部残卷以校段注，则段氏所改易与唐本暗合者，不可胜数。

张舜徽十四岁读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，《广校讎略》论“段玉裁”只是早年治学的心得体会。对段玉裁与顾广圻关于“立说之是非”与“底本之是非”、“勇于改字”与“不校校之”的校勘原则争论，《广校讎略》既有“考证家不妄改字”申顾，又有“金坛段氏之勇于改字”申段，不偏不颇，实事求是。在“四郊”与“西郊”、“二名不遍讳”与“二名不偏讳”的具体问题争论中，《广校讎略》申段批顾：

迨段玉裁说出，而后偏讳为遍讳之讹，始成定论；

段玉裁乃为《四郊小学疏证》一篇以申孙（孙志祖）说，顾氏复为《学制备忘之记》以驳之，往复论难，相攻若仇。今两家之书俱在。段氏原本经述，义证翔实；顾氏之说，则未免意气相争，殊不足以厌人意。<sup>①</sup>

顾广圻是钱大昕的弟子，精熟版本，擅长校勘，“持文字音韵之原，以通经史百家之义，其订正精谨，考辨详明，与钱竹汀詹事、高邮王氏父子并驾齐驱”<sup>②</sup>，甚至被推为“清代校勘第一人”<sup>③</sup>。张舜徽主张通学，早年对精于版本、目录的专家不太重视，故《广校讎略》对顾广圻评述多有不妥。后，匡正旧书：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仍批顾氏“意气相争”，倾向于段氏“四郊”说，但对“四郊”“西郊”之说存疑<sup>④</sup>；最后，《清人笔记条辨》主顾氏“二名不偏讳”说，且承认《广校讎略》的失误：

段玉裁复为‘二名不遍讳’以申岳（岳珂）说，谓偏讳为遍讳之讹。今观沈氏（沈涛）所言，与段

立异，沈固段之弟子，可谓不墨守师说矣。余早岁服膺段说，及今思之，仍以作‘偏’者为是。盖偏者，单一之谓也，凡以二字为名者，单字分见则不讳，即所谓‘言征不言在，言在不言征’之意耳。<sup>⑤</sup>

对段玉裁，张舜徽由仰慕到批判、由崇拜到反思，进而由学术批判上升到道德评判，越来越严厉。例如，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中说：

其次，如卷11、12所载《与顾千里讨论学制》诸书，争西学、四学，一字之差，连篇累牍，至于毒詈丑诋，有如悍妇之斗口舌。以七十余岁老翁，不惜与后生较短长，角胜负，至于如此，亦未免盛气凌人矣。<sup>⑥</sup>

可能《广校讎略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、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说文解字约注》评说太多，《清儒学记》对他只字不提，《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》（张舜徽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）没立他的传；对顾广圻，他因逐渐“了解而生爱慕情”，例如《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》为他立传；《清人文集别录》特地更正《广校讎略》对他的批评：

论者以为千里晚与段玉裁论学制相牴牾，互攻若讎，乃藉六书之说，诋排段氏，实以中伤段氏，岂其然乎。且千里与段氏，始交甚契，非特无微词，而推尊之甚。千里之言曰：“凡学须名其家。金坛段君，学之名其家者也。所著有《六书音均表》等，未刻有《说文注》等，共若干种。忆始相识在乾隆壬子，即见谓曰：‘《音均表》解人，向为王怀祖，今乃得足下耳。’此言固未必然而其所以厚圻者，诚可谓至矣。”（是集卷11《刻释拜序》）千里既尝为段氏刻《释拜》于江宁，以广其传，而其倾服之诚，至于如此，可谓有相知之雅。其后因辩论学制，致起衅隙，往返书牍，具刻《经韵楼集》中。以余观二人意气之争，段氏实不能辞其咎。读《经韵楼集·答黄绍武书》，可知当日舆论，亦多责难段氏。而李兆洛复称千里进退粥粥，词色姬煦，徒以恣愿自守（见李氏所撰墓志铭，载《养一斋文集》卷11）。兆洛亲接其人，而所言如此，宜若可信千里之无争气也。<sup>⑦</sup>

张舜徽并不固守《广校讎略》的观点，通过别录清人文集，他修订前说。为超越“段注”，从1961

①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《广校讎略》卷4《校书必深于小学》第69页。

②孙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》引傅增湘《思适斋书跋序》第578页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。

③孙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》引日·神田喜一郎《顾广圻年谱》第572页。

④张舜徽《中国史籍校读法》第298—299页，《中国文献学》第71—72页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。

⑤张舜徽《清人笔记条辨》卷6《铜熨斗随笔》8卷交翠轩笔记4卷瑟榭丛谈2卷》第251页。

⑥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8《经韵楼集》第327页。

⑦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12《思适斋集》、《思适斋书跋》第345—346页。

年始,他取金文、甲骨以证释《说文》,以过去批注本为基础,重新加以补充、修订,历时十载,撰成《说文解字约注》。《广校雠略》对段氏的评述,固有不妥之处,却是对段玉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,客观记录张舜徽治学的心路历程。从《广校雠略》(1943年)对段氏学术的推介到《清人文集别录》(1963年)对段氏人格的批评、《说文解字约注》(1983年)对段注的修订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(1986年)对段说的修订,先扬后抑,构建与通人硕儒相反的研究模式,暗合其由博返约的治学理路。

### (三)对清代众多学者学术细节的评判为全面整理总结清学的先路之导

《广校雠略》涉及清代学者实在太多,从清初到清末,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有。其中既有大量汉学家,又包括一定数量的宋学家,如陆世仪、庄存与、龚自珍、魏源、曾国藩等;不仅有通人硕儒,亦有专门名家,如经学家、史学家,金石学家、版本学家等;即使那些不被重视的学者,或不太知名的学人,他都细致耙梳整理,甄别得失。可以说《广校雠略》涵盖整个清代学术。

《广校雠略》评判清代学者得失之处太多,不能一一列举,下面仅就有关“古书体例”这一部分,列举清代一些学者不熟悉古书体例而致误的情况,例如:

①“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名皆后人补题”说:  
“江永《群经补议》且力斥韩说(韩愈谓孟子既没,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以为书)之非,不知尊崇孟子,别自有在,正不必坚谓7篇之书定出轲手。”

②“误以承学为先师”说:“自来若侯康、姚振宗、曾朴诸家所撰《后汉艺文志》,率称谢该《左氏传释》一书,……志艺文者,直题曰谢该《左氏传释》,宁有当乎?”

③“书有名近而实殊者不可连举并称”说:“清末朱次琦尝教其弟子曰:‘《九通》,掌故之都市,士不读《九通》,是谓不通。’朱氏斯言,似是而实不然也。”

④“称引篇目不可据后人改本删标题字”说:  
“谭嗣同《石菊影庐笔识》曰:‘《三国志》不立纪传之名,则每篇皆志,君臣不异……’谭氏所言,失考甚矣。”

⑤“后人著书不复为叙传之故”引李慈铭的言论:

自马、班至李延寿,作史皆有叙传,自述家世

及所以作书之意。晋陈寿以蜀臣仕司马氏,作《三国志》,斥故国为伪朝,其叙传无所附,故竟不立,范曄《后汉书》因之。自唐以后,设馆修书,史皆官造,私门著述之业既亡,故叙传亦绝。欧阳《五代史记》本系私撰,而其先世皆仕南唐,既斥李氏为僭窃,自不敢复叙其家世于后,故亦阙而不为。

然后用“舜徽按”评判:

李氏此言,似是而实大谬,由不论世之过也……自魏以下,著书者率自题姓名于卷端矣,或不自题而人补之,其篇目又胪列于前,复奚用叙传之文殿其尾耶?陈、范二家盖深知著述体例,故辍不复为。且范氏以宋人修《后汉书》,时代悬远,又不合自附叙传。后之为史者,自沈约以逮李延寿,虽皆有自叙,徒侈陈家闕耳。揆诸马、班之旨,不啻毫厘千里,未可以著述之法绳之矣。<sup>①</sup>

李慈铭“一生读书数十年,考论推求,自多创获”<sup>②</sup>,然“一生又好雌黄,不轻许可,终不免文士陋习”<sup>③</sup>。就是这样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,张舜徽曾“反复究览”<sup>④</sup>,知其“有涉猎之功,无专精之业”<sup>⑤</sup>。对李慈铭这番似乎很有“识见”的“快人妙语”,张舜徽抨击他不明古书体例的流变而致误,考证精核,见识高远,令人心服口服。

从上可看出,张舜徽非常熟悉清代学术,《广校雠略》谈论清代学术随口而出,如数家珍,这源于早年“酷嗜乾、嘉诸儒之学”,“寓目300余家清人笔记、1100余家清人文集”。《广校雠略》广征博引清人考据成果,对清学作初步爬梳整理,为他50岁以后撰写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、《清儒学记》清扫前进道路上的障碍。

另外,张舜徽文献学、清学研究的著述是其学术的代表成就,把《广校雠略》放在张舜徽学术中考察其历史地位,能够执简驭繁,持类统杂。然而张舜徽学术还包括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哲学研究,但《广校雠略》对它们的影响没有像文献学、清学那样直接,且这几方面范围(包括文献学、清学)有交叉,内容有重叠。因而《广校雠略》在张舜徽学术中的地位,应以文献学、清学作重点探讨,可避免浩繁无边、不得要领的赘述。

(责任编辑:黄云鹤)

①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《广校雠略》第44页。

②张舜徽《清人笔记条辨》卷9《越缦堂日记》第355页。

③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12《越缦堂文集》第506页。

④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12《越缦堂文集》第506页。

⑤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12《越缦堂文集》第506页。